

再探跨國主義：理論化與區域化的檢視*

楊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

以跨國主義為旨趣的國際關係研究在 1970 年代之後逐漸成為焦點，然而，相關論述受限於國家中心論的框架，使得國關學界對於跨國主義的認知與探索多半受限於國家與政府所操作的權力政治邏輯中。從研究議程來看，早在冷戰時期，歐美國關知識社群中即有不少論者試圖在理論層次上重新界定、詮釋這種在本質上超越傳統地域/疆界侷限、在合作模式上日趨多元的「跨境模態」，並進一步透過理論化的工作，將其發展成與現實主義的「衝突」典範截然不同的思維。隨著全球化效應的持續發酵，各種來回「穿」梭在傳統「國」家疆域之上的活動愈見興盛，不但從實踐層次上直接挑戰了西發利亞式的國家主權觀，同時在理論層次上試圖消解傳統國關理論堅持以國家作為唯一行動者所衍生的各類基本假設。有鑑於此，本文重新檢討當代跨國主義的跨境模態，並將其置於理論化與區域化的脈絡中，以東南亞經驗來檢視跨國主義新議程的轉換路徑，及其對現有區域整合的可能影響。

關鍵詞：跨國主義、理論化、區域化、國際關係理論、跨境模態

*兩位匿名審查人就本文的理論思路與經驗參照提供諸多寶貴建議，謹在此特別致謝。

壹、爭論中的跨國主義：二元論

冷戰時期的國關研究主流典範很明顯地仍受制於國家中心論 (state-centrism) 的傳統空間論述與世界觀之限，大體上以國家為主要分析單元，藉由國家中心論來架構國際研究的基本假設與論辯議程。¹直到 2012 年的今天，當我們援引 Barry Buzan 的「去中心型全球主義」(decentred Globalism) 新論述來強調全球政治並不存在超級強權的政治現實，或者大力倡議每一個區域都應具備自身的發展邏輯之際，各種看似新穎的理論說法還是脫離不了國家中心論的框架。²

在國際研究的知識社群中，以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為主題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出現在 1970 年代之後。這種略帶浪漫色彩或充滿理想期

¹ 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經典，可以參見：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 Annette Baker Fox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1966). ; John W. Burton, *Systems, States, Diplomacy and Ru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ghton: Wheatsheaf, 1983). ;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Jonathan Monten, "Thucydides and Modern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2006), pp. 3-25. ; 較近期的理論性研究專書，特別是循著國家中心論主張重新探討現實主義傳統的批判、整理與反省，亦可參見：Annette Freyberg-Inan, Ewan Harrison, & Patrick James, eds., *Rethinking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 Charles L.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² 請參 Barry Buzan, "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 Decentred Glob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 1(2011), pp. 3-25.

待的跨國主義論述深受國際關係自由主義學派(IR liberalist)的影響，試圖為國際研究醞釀另一種新的典範。一般來說，從事跨國主義研究的學者會將特別重視跨國空間、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甚至是以個人為分析單元的國際遷徙現象上，藉以探討各種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的存在意義，以及相關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對國際社會的影響。³相較之下，有些研究者則認為，所謂的「跨國」並不是相對於「國家」的新分析層次(level-of-analysis)，反而是一種同時包含國家、超國家、或者次國家等多層次互動關係的跨域活動。⁴

的確，對於國際研究知識社群而言，無論是從事「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的解析，或者探究各種跨國主義新議題或新模態(new transnationalist modalities)的類型，⁵儘管研究者期望能就跨國現象的發展與運作邏輯提出適當的解釋，但相關論者多半在著述與論證的過程中不自覺地一再召喚國家中心論的幽靈，⁶使得「國家」、「政府」、「主權」等宰制性的權力概念充斥、滲透在跨國主義研究的議程中。正因為跨國主義在概念化（甚至在操作化）過程中對於國家中心論有著欲拒還迎的立場，但其知識體系的建構與累積過程中卻又明顯強調社會中心論的色彩，對於理論研究者而言，箇中知識體系的對彰態勢及其醞釀、轉化與變遷的方向性，饒富深意，值得細究。

³ Steven Vertovec,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3.

⁴ James Anderson, "Questions of Democracy, Territoriality and Globalization," in James Anderson ed., *Transnational Democracy: Political Spaces and Border Crossing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6.

⁵ 譬如，人權議題的經典探討，可參考：Kathryn Sikkink, "Trans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Human Right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1, No. 3(1998), pp. 516-523.

⁶ 這個譬喻援引自 Benedict Anderson 對於民族主義(nationalism)與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再現的「召喚」(interperlate)概念。

從 1960 年代開始，國際研究知識社群內開始有若干代表性的人物，試圖從新型態的跨國互動經驗來重新檢討國家中心論的假設，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尤以 Robert O. Keohane 與 Joseph S. Nye 所提出的世界政治典範(world politics paradigm)，深受理論研究者的重視。Keohane 與 Nye 二人試以彙整跨國互動(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s)、跨政府關係(transgovernmental interactions)以及國與國互動關係(interstate interactions)三個互動結構與關係脈絡的發展為旨趣，修正了長期以往深受國家中心論思維過度簡化的世界觀，並轉以分殊化的思維重新設想當代世界政治的運作邏輯、關鍵議題以及主要行動者。在歐美國家從事國際研究的知識社群，開始對於在本質上超越傳統地域/疆界侷限、在合作模式上日趨多元的跨國主義模態或跨境模態(border-crossing modality)萌生關切，並且希望能在理論層次上重新界定、詮釋相關現象，進而將這種「經驗上的」跨境模態發展成與現實主義(realism)之衝突典範截然不同的論述。⁷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 Nye 與 Keohane 於 1970 年代提出跨國關係研究的新思路後，國際研究社群對於各種跨國現象的蓬勃發展產生了極為濃厚的興趣，但這也間接造成研究者大量從事跨國關係與活動的個案探討與經驗研究，較少有人願意開發或投身跨國主義的理論化工作。⁸

⁷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98. 諸如 Robert O. Keohane、James A. Field、Edward L. Morse、Robert Gilpin 以及 Joseph S. Nye 等人之所以會從事跨國主義研究，除了希望能在理論層次上有所進展，另一項重要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提供冷戰時期的美國各種有助於確保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工具。譬如，當時由 Keohane、Nye 等人自 1968 年開始醞釀並在 1970 年正式編輯成冊的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一書，即含納了美國可直接主導或間接影響的國際經濟、國際金融、科學、科技、能源、商業網絡等議題，而各篇專章的作者亦就當時的美國外交政策方針提出若干建議。

⁸ Bastiaan van Apeldoorn, "Theorizing the Transnational: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No. 2(2004), p.

儘管如此，隨著全球化效應的持續發酵與強化，各種新型態的跨國現象逐漸興盛，並且擴大展現在各種來回「穿」梭在傳統「國」家疆域之上的密集活動上；⁹它們不但在行動層次上直接挑戰了西發利亞式的國家主權觀，同時亦在理論層次上消解了傳統國關理論堅持以國家為唯一行動者所衍生出的各類基本假設。¹⁰很明顯地，從 1960 年代迄今的一系列變革，成為影響當代跨國主義質變的關鍵轉折。更重要的是，當前跨國主義的全球實踐早已對區域秩序的運作與重構邏輯造成頗為深遠的影響。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認為由跨國主義的多樣實踐所造成的新政經現象必然將影響區域秩序的形構過程；不過，關鍵在於究竟是哪一種形式的跨國主義會造成區域秩序的何種改變？從概念層次來看，國家中心論跨國主義(state-centric transnationalism)或者是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society-centric transnationalism)孰能有效引導區域整合路徑的深化或者是轉換？爲了要探索箇中理路，研究者有必要重新拆解傳統理論典範與新政經現實之間的對彰關係，一方面謹慎地處理非國家行爲者試圖稀釋國家中心主義立場的可能軌跡，同時亦需更細緻地檢視國家中心跨國主義對社會中心論舉措與實踐的強烈逆襲。¹¹有鑑於此，本文擬重新抽

142.

⁹ “transnationalism”一詞的中譯除了常見的「跨國主義」，亦有學者譯爲「穿國主義」。

¹⁰ Anssi Paasi, “The Resurgence of the ‘Region’ and ‘Regional Ident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Observations on Regional Dynamics in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2009), pp. 121-146.

¹¹ 尤其正在亞太區域醞釀與發展中的「國家保護責任」理念(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簡稱 RtoP)，實能呈現出上述兩股力量對彰的態勢，請參見：Jenina Joy Chavez, “Social Policy in ASEAN: The Politics of Integrating Migrant Labour Rights and Protection,”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 7, No. 3(2007), pp. 358-378. ; Alex J. Ballemey & E. Davies Sara,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40, No. 6(2009), pp. 547-574. ; CSCAP, *CSCAP Study Group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toP): First Meeting Final Report* (Jakarta: CSCAP, 2010). ; CSCAP, *Council for Security*

理跨國主義知識體系的理論內涵，嘗試「再」理論化當代跨國主義的跨境模態，並將其置於理論化與區域化的脈絡中，一方面藉著理論化的檢視來檢討跨國主義新議程的延續與轉換之知識基礎，另一方面則是藉著區域化的檢視來分析跨國主義活動對於當前東南亞區域整合經驗的可能影響。

貳、跨國主義的理論化：國家角色的抹除與再現

美國哈佛大學「魏德海國際事務研究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近年來開始推動一項「跨國研究倡議工作坊」(Transnational Studies Initiatives Workshop)。從 2010 年開始，參與此一系列工作坊的學者來自於歷史學、社會學、文學、藝術、教育、非政府組織與區域研究等多元領域。他們認為，當前的「跨國」研究或「跨國主義」研究的確是一門不斷茁壯的知識體系，但其所囊括的內容卻因為學科領域的多樣化而顯得零碎。¹²

跨國研究倡議工作坊迄今已經舉辦了十餘場研討會議，多半以移民、非政府組織、女性、甚至是博物館為題，針對鑲嵌在跨國現象中的認同、理念、結構與體制進行相當剖析與論辯，旨在打造出更清晰且具比較意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 Study Group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toP) Final Report (Phnom Penh: CSCAP, 2011).

¹² “Research Activities,” *Weatherhead Center*, <<http://www.wcfia.harvard.edu/seminars/tsi>> (July 23, 2012).

義的跨國主義研究議程。值得注意的是，參與座談的講者與討論者對於各種「非」國家的跨國行為者所具備的當代社會意義尤其重視，並且試圖耙梳跨國主義在特定學科領域中的知識背景。就此，隱含在「人際間多重連結與互動」或者是「跨越傳統民族國家疆域的制度樣態」中的「跨國性」早已不證自明。¹³然而，單就系列座談的成果來看，當研究者大量地藉著理論化「跨國性」的構成因素、分析單元與關懷對象，進而抹除或排除(rule out)「國家性」(statehood)、再製跨國主義的新問題意識與研究議程的同時，鑲嵌在跨國現象中且長期對彰（甚至緊張）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卻隨之浮現。正因為如此，隨著跨國行為者無法迴避來自於國家的干擾或介入，或者當國家政府無法阻隔跨國流動的對內滲透與向外蔓延之際，跨國主義研究者實有必要重新斟酌隱含在其中的國家與社會對彰關係。

一、跨國主義研究首部曲：以跨國關係為起點的概念化進程

本文認為，「跨國」(transnational)一詞的廣泛引述與複製應用，或許是造成跨國主義研究在概念化與操作化陷入混淆的來源。從字源上看，*“trans”*有超越、穿越之意；據此，*“transnational”*一詞具有穿越國家疆界與超越領土空間限制的意義。在跨國空間裡，承載著穿梭性質的構成份子或分析單元包含了個人、組織、機構或團體，它們的跨國活動展現在

¹³ Steven Vertovec,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 No. 2(1999), pp. 447-462.

不同的議題上，並且發展成相對應的跨國現象，如跨國婚姻(transnational marriage)、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或者是跨國流動 (transnational mobility)。從知識累積的脈絡來看，針對在地理空間上超越傳統國境界線、在參與結構上涉及兩個以上明顯行為者(identified actors)的互動模式進行探索的種種關注，正逐漸累積成跨國主義的知識體系。不過，單從片面的名詞界定上仍然難以判斷跨國互動的明顯行為者包括哪些對象？是否可以含納國家？又該不該「繞過」政府？或者，能不能「僅」著重在非政府行為者的跨國關係上？本文認為，這些提問可以從 Joseph S. Nye 與 Robert O. Keohane 在探索當代世界政治互動模式的經典分類中，找到若干解答。

Nye 與 Keohane 認為，世界政治的運作邏輯是由國家、政府部門、國際組織、國際組織部門、跨國組織、跨國組織的部門或個人之間的互動模式所構成。¹⁴這六種不同的國際行為者彼此形構出三十六種互動模式。對於 Nye 與 Keohane 而言，其中有三十二種模式被視為是跨國關係的具體實踐，而唯有「國家與國家」以及「國家與國際組織」等四種互動模式被稱之為國家間的互動關係(inter-state interaction)，不在跨國關係之列（請參見表一）。Nye 與 Keohane 的互動類型列連表與傳統的國家中心論者進行對話，同時也正式區別了國際互動與跨國互動的差異。他們所主編的《跨國關係與世界政治》(*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一書，成為引領 1970 年代以降的國關學者在探討跨國主義研究上一定得引述(must cite)的經典之一。

¹⁴ Joseph S. Nye Jr. & Robert O. 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 Conclusion," in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71-398.

Nye 與 Keohane 的跨國主義研究關鍵詞是「跨國關係」，他們藉著對國家與國際組織兩個核心行為者的透晰，看似成功地將世界政治中的互動符號解離，透過國家行為者與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區別，試圖抹除國家或政府在跨國關係與跨國主義中的主導者角色。不過，囿於 1970 年代的冷戰時空環境，Nye 與 Keohane 的貢獻被視為是替為國家之外的互動關係與場域找尋充分類型化的理論模式。一旦互動行為者之一方為國家或國際組織，如表 1 的跨政府關係（TG，由國家與政府部門、國際組織部門所構成的互動模式）與跨國互動（TN，如國家與跨國組織、跨國組織部門或個人所構成的互動模式），他們還是將這些關係列入籠統的跨國關係中，並沒有進一步細緻區分。由此顯見，由 Nye 與 Keohane 所接襲的首波國際關係跨國主義研究，儘管試圖藉著釐清國家行為者與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模式，並彰顯跨國（非國家）行為者的重要性，但在此之中，我們亦清楚觀察到，要抹除國家角色仍困難重重。

表 1 國際行為者的互動模式與跨國關係

主要行為者	國家	政府部門	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 部門	跨國組織	跨國組織 部門或個人
國家	IS	TG	IS	TG	TN	TN
政府部門	TG	TG	TG	TG	TN	TN
國際組織	IS	TG	IS	TG	TN	TN
國際組織部門	TG	TG	TG	TG	TN	TN
跨國組織	TN	TN	TN	TN	TN	TN
跨國組織部門 或個人	TN	TN	TN	TN	TN	TN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並修改自(Nye & Keohane, 1970: 382)。

說明：根據 Nye 與 Keohane 的定義：IS 指的是國家之間的關係(inter-state)，如表 1 粗體字所示；TG 指的是跨政府關係(trans-governmental interaction)；TN 指的是跨國互動(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而 TG 加上 TN 則構成了跨國關係，誠如表 1 灰色部份所示；TG 加上 TN 與 IS 則構成當代世界政治互動的主要脈絡。

二、第二波跨國主義研究浪潮：國家／社會中心論的對話

儘管研究跨國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者欲打造以非國家、非政府行為者為焦點的研究議程，但諸如 Keohane 等人所接襲的廣義跨國關係，卻還是無法抹除國家中心論的痕跡。隨著冷戰的結束與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影響，被視為是第二波跨國主義研究的浪潮開始出現在 1980 年代末期與 1990 年代初期。在此時期，國關學界對於跨國主義的討論，多半環繞在跨國議題的分析、¹⁵跨國合作經驗的討論、¹⁶以及跨國行為者的角色與功能上。¹⁷當國家的角色在相關研究中被逐漸淡化，跨國主義研究的系譜因而有了截然不同的風貌。在 1990 年代的文獻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誠屬 Thomas Risse-Kappen 所編著的《重拾跨國關係：非國家行為者、國內結構與國際制度》(*Br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如果說 Nye 與 Keohane 的概念架構是「理論化」跨國關係的濫觴，則 Risse-Kappen 等

¹⁵ 譬如，M. J. Peterson, "Transnational Activity,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World Politics," *Millennium*, Vol. 21, No. 3(1992), pp. 371-388. ; Jackie Smith, et al.,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ichard Price, "Reversing the Gun Sights: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argets Land Min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3(1998), pp. 613-625. ; Matthew Evangelista, *Unarmed Forces: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o End the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⁶ 譬如，T. Rochon, *Mobilizing for Peace: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P. Wapner,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World Civic Poli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 Alexander Cooley & James Ron, "The NGO Scramble: Organizational Insecurit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national A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2002), pp. 5-39.

¹⁷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idney Tarrow, "Transnational Politics: Conten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 1(2001), pp. 1-20. ; Alexander Cooley & James Ron, "The NGO Scramble: Organizational Insecurit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national A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2002), pp. 5-39.

人的研究則可被視為是繼受 Keohane 等人的論述，並試圖重置跨國關係研究「立場」與「導向」的重要主張。

首先，在研究跨國主義的立場上，Risse-Kappen 等人對於 Nye 與 Keohane 的跨國主義研究多有批評。他們認為過去的分類過於精簡，並主張新的跨國主義研究應該將重點置於非國家行為者的重要性與特殊性上，進而構建出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研究議程。有鑑於此，相關論者強調當代跨國關係的發展其實是一種「經常性」的穿越國家疆域之互動關係，而在這種互動關係中至少有一方會是非國家行為者。由於非國家行為者在性質與定位上的不同，彼此所構成的互動關係也較國家間或政府間關係更能展現出深受全球化影響的現有國際情境。¹⁸Risse-Kappen 等人對於跨國主義研究的貢獻係提出「各種跨國行為者或跨國聯盟都將對國家政策造成影響」的命題，並且強調跨國行為者對國家政策影響程度的差異，多半與「國內結構」以及「國際制度化程度」有關。就「國內結構」來說，Risse-Kappen 強調，只要國家對於國內結構的掌控程度越強，那麼跨國行為者將會愈難介入國內社會或政治體系並發揮影響力。另外，在「國際制度化程度」方面，一旦國際制度化所影響的議題範疇越來越多元、受影響與牽制的程度日漸深化，則國家政府真正能宰制的領土疆界與場域必然更顯脆弱。然而，正當《重拾跨國關係：非國家行為者、國內結構與國際制度》一書看似成功地將國家或政府導出跨國關係（研究）的應然範疇外，相關論者對於「非國家行為者」與「國內結構」等關鍵因素的討論，仍然無法徹底消除國家潛在的影響力或干涉痕跡。在新一波跨國主義的研究議程裡，國家中心論與社會中心論的對彰

¹⁸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p. cit., p. 3.

態勢，仍相當明顯。

的確，國際關係跨國主義研究的知識累積與進展，自 1970 年代開始便圍繞在國家中心論與社會中心論主張的對話、辯論或者是潛在的協作關係當中。以跨國流動現象、非政府組織、或者是其他跨國行為者為研究關懷，並削弱國家在跨國主義研究與實踐中核心角色的論述，漸形豐富了社會中心論的內涵。儘管如此，堅守國家或政府核心地位的跨國主義研究者亦大有人在，相關論者透過各種方式再現國家的影響力，並試圖提醒社會中心論的支持者不可抹除國家與政府的角色，更不能將其排除在跨國主義研究議程外。對於國家中心論者來說，各種社會中心論的對話對象、假設基礎與推論邏輯，以及據此所提出的理論修正、概念修飾、或者論述批判，仍然環繞在國家身上，更重要的是，當代世界政治的現實運作邏輯還是無法脫離國家作為主要行為者的不變規則。對於他們而言，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者真正「能」彰顯的，只在於跨越國家疆域的各種活動所具有的新社會意義，儘管各種跨國流動現象鬆動、甚至瓦解了傳統地理疆界的限制，或許也成功挑戰了國家轄權(jurisdiction)的至高性，但它所倡導的核心能動者(agent，也就是跨國行為者)始終無法取代國家或政府，成為國際關係或跨國關係的核心主體。

三、新的跨國主義研究趨勢：延續與創新

社會中心論者面對來自於國家中心論者的逆襲與批判，從 1990 年代末期開始將全球化現象的加快發展與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需

求導引入跨國主義研究議程中，轉而將全球性、跨國性、與在地性等三種截然不同但卻彼此關連的迴路，整合成新型態的研究架構，同時據此為新的跨境模態找尋理論上的參照。¹⁹特別是在最近幾年，跨國主義研究者對於跨國現象的關注焦點，更重視跨國行為者的反抗作為(resistance)及其所牽涉的權力政治網絡，²⁰研究者亦從不同的區域經驗或跨國實踐中找尋更豐富的參照。²¹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蓬勃發展的跨國現象對於世界政治的運作帶來新挑戰，諸如恐怖主義的威脅、人口走私與販賣現象的惡化、大規模天然與人為災難的持續不斷，使得跨國主義的研究必須更與時俱進，納入新的經驗元素或制度參照。²²

上述新趨勢的發展，與其說是第三波跨國主義的研究浪潮正在浮現，倒不如將其視為是由強化版的社會中心論主張所啟動的延續性對話與內部辯論。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各種針對各種跨國關係的研究與批判、跨國議題的分析、跨國合作經驗的討論、跨國行為者角色的探究，仍然不脫舊有的論辯，甚至間接再現了國家在當代跨國關係研究議程裡的中心地位。儘管社會中心論者在近年來提出了許多激烈的批判，甚至一度撼動

¹⁹ Sidney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Nicholas Tsagourias,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udger Pries ed., *Rethinking Transnationalism: the Meso-link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²⁰ Clifford Bob, *The Marketing of Rebellion: Insurgents,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Shareen Hertel, *Unexpected Power: Conflict and Change among Transnational Activis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²¹ Mitchell A. Orenstein, Stephen Bloom, & Nicole Lindstrom, eds., *Transnational Actors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Transitions* (Pittsburgh: University Pittsburgh Press, 2008).

²² Kimberley L. Thachuk ed., *Transnational Threats: Smuggling and trafficking in Arms, Drugs, and Human Life* (West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 Chukwumerije Okereke, Harriet Bulkeley, & Heike Schroeder, "Conceptualizing Climate Governance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9, No. 1(2009), pp. 58-78.

國家中心論知識體系的核心假設，將傳統上認定的「國家是國際關係中的唯一行為者」轉換成「重要或具有關鍵影響力的行為者」；但這種理論假設上的調整並無損現實主義的立論，反而間接擴展了此種現實主義國家中心論所能影響的經驗範疇。

整體來看，近期國際關係跨國主義研究的新趨勢，具有兩個特色：首先，跨國行為者的功能、影響力、定位與角色，已經從過去被視為是邊緣性的探討，轉換成跨國主義研究的核心主題；不過，但國家同時也開始調整其權力內涵與功能，藉此重新確立治理者的核心地位。跨國行為者（譬如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團體）活躍於發展合作與公民社會議題中，藉著推動善治(good governance)理念並促進基層公民參與，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²³另外，在許多新興議題方面，非政府行為者成為全球治理過程中另一種相對於公領域權威（即國家）的另類權威(alternative authority)角色，實際、深入地參與並影響跨國主義的實踐過程。²⁴儘管如此，絕大多數的跨國主義研究文獻並不否認跨國行為者在運作與影響過程中多少仍受到國家體制(statecraft)的限制。如同 Sidney Tarrow 的研究所示，國家在跨國政治（特別在政策層面）之所以能持續受到重視，是因為國家始終能扮演「越界」干預與能使(enabling)的跨國角色。²⁵

²³ Andrew McGregor, *Sou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105-107.

²⁴ Raymond L. Brya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ality: 'Consuming' Biodivers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Philippines," *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No. 2(2002), pp. 268-292. ; Lars H. Gulbrandsen & Steinar Andresen, "NGO Influe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yoto Protocol: Compliance, Flexibility Mechanisms and Sink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4, No. 4(2004), pp. 54-75.

²⁵ Sidney Tarrow, "Transnational Politics: Conten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001), pp. 1-20.

研究國際關係跨國主義的新文獻在論述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與跨國運作過程時，大多若有所指地對應到國家的角色，並從國家與其他多元治理者互動型態的梳理中，直接或間接透露了國家於治理網絡中所處的核心位置。當然，也開始有研究者不再堅持將國家因素完全抹除，而是透過治理理論與實踐的引入，試圖進入國家中心論的內部迴路中，使其看待世界、解釋世界的說法進行質變。由此可見，儘管延續性的社會中心論與國家中心論的對彰仍然存在，但彼此之間在理論對話上或實際經驗政治上的相互影響與滲透，造成了當前跨國主義研究與早期文獻之間的明顯差異。

另一項重要的趨勢係反映在跨國主義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展示上。隨著歐洲、美洲、亞洲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進程的加快，各種跨國活動、交流與合作計畫的出現，將區域打造成展示跨國主義理想與實踐的重要試煉場域。舉例來說，近年來有許多學者試圖從區域或區域主義的角度探索跨國主義的發展實況，譬如，T. J. Pempel 重新審視了東亞地區的跨國主義，他從結構的角度切入，清楚指出絕大多數的東亞國家與政府之間都存有潛在衝突，因而使得東亞區域結構呈現碎裂化(*fragmentation*)的樣態。不過，如果進一步觀察在國家層級之下(*beneath state level*)的東亞區域內涵，將可以發現跨國聯結與越境活動的蓬勃發展形成了另一種超越國家衝突結構的活絡圖像。這種超越國家疆界的活動係由私部門、公民社會或非政府組織團體所串連，構成了綿密的「跨國網絡」(*transnational web*)。Pempel 進一步指出，雖然此一跨國網絡乃由跨國行為者藉著由下而上(*bottom-up*)的路徑來搭建，²⁶但各種由上而下

²⁶ T. J. Pempel, "Introduction: Emerging Webs of Regional Connectedness," in T. J. Pempel ed.,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op-down)的政府制度建構卻仍是影響、甚至有助於促東亞進一步區域化的關鍵勢力。在許多區域層級的跨國治理過程中，儘管跨國行為者、地方社區或者是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參與及治理過程中扮演極為吃重的角色，但治理成效的良窳還是會受到國家能力的影響，譬如跨國條約的簽署、對治理資源的管控等。²⁷

舉例來說，人權議題是當前國際社會最關切的東亞跨國議題之一，近年來在「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簡稱 ASEAN)發展「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建構計畫中，人權保障是否能制度化、法制化深受各界的矚目。在人權保障的區域合作方面，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儘管提供了新的政策影響力，同時也為人權議題的跨國倡議網絡奠下重要基礎，但國家仍掌握最終的決定權。²⁸由此可見，國家不僅在全球層次的跨國議題上被視為是決定跨國網絡或跨國主義實踐成果的成敗因素，在區域層次的跨國議題上更有充足的政治籌碼與斡旋空間，藉著善用政策工具來發展、並擴展有助於己身利益的跨國網絡。

整體而言，「社會中心論」者一再強調的「基進跨國主義」

2005), p. 2, p. 6, p. 20.

²⁷ Cheong So-Min, "Controlling the Coast,"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Vol. 51(2008), pp. 391-396. Andreas Klinke, "Deliberative Democratization across Borders: Participation and Deliberation i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4(2011), pp. 57-60.

²⁸ Rashidah Abdullah, "NGO Advocacy on Women's Health and Rights in Southeast Asia," *Development*, Vol. 46, No. 2(2003), pp. 33-37. ; Hao-Puy Phan, "Institu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Southeast Asia: A Survey Repor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1, No. 3(2009), pp. 468-501. 特別是在 Hao-Duy Phan 針對東南亞人權保護議題所進行的民調中，有 88.9%的非政府組織受訪者積極支持相關保障倡議。有將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東協國家的不干涉內政原則是東協人權機制發展的主要障礙；另外，有超過八成認為政治環境是影響「東南亞人權法院」(Southeast Asia Court of Human Right, 簡稱 SEACHR) 能否建立的主要因素；最後，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均認為，缺乏政治意願將導致東南亞人權法院無法順利產生。

(transnationalism from the below)，認為當代跨國關係的運作乃伴隨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而來，而各種非國家行為者及其所建構的影響力網絡形塑了跨國關係的運作迴路；相較之下，「國家中心論」則是始終潛藏在當代跨國主義研究議程中的意識型態，強調國家才是影響跨國主義理念與實踐的主要行為者。基於上述討論，本文認為將跨國主義發展的新趨勢置入區域化進程中，更能彰顯出社會中心論與國家中心論兩者間的對彰關係，甚至可以進一步發現，在某種程度上，這兩套立場的核心行為者之間其實存在著相互依存的協作關係。也就是說，從區域的範疇與區域整合的角度來看待跨國主義的理念與實踐，將可以發現新的跨國主義研究議程不再由非國家行為者獨佔、也不會是國家的獨角戲。

當研究者將新的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研究焦點置於區域脈絡中，一方面除了探討跨國行為者的重要性之外，更需要重新檢視國家行為者與跨國行為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interplay)，並且檢討此一相互影響關係對於區域將造成何種影響。本文認為，此種順勢「將國家帶回」(bring the state back in)各種跨國活動經驗脈絡與議題領域的趨勢，一方面將有助於增添國家中心論在跨國主義理論化過程中的潛在影響力，另一方面亦將藉著跨國行為者的越境聯繫，重新打造出特殊的跨國主義模態，從而影響、衝撞、甚至可能會挑戰以國家為主要構成者的區域秩序。

參、跨國主義區域化：國家／社會中心論的搏和²⁹

研究者從許多經典的國關理論文獻中，都可以觀察到國家與存在於國際體系中的各種「秩序」有著一定程度的親近性。³⁰這種親近性的展現，鞏固了國家在國際關係中作為秩序建構者、維繫者（甚至是破壞者）的主導地位。就此而論，「秩序」本身的內涵、價值、目標、甚至是維繫的方式，很容易受到能動者的影響從而展現出迥異的風貌。當代以「秩序」為旨趣的國關研究文獻卷秩繁浩，但從諸多文獻中不難發現共有的知識起點闕如 Hedley Bull 在 1977 年所著的《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Bull 認為，所謂的「秩序」（他稱之為社會秩序），指的是不同事物會依循某種模式進行聯結，從而使得事物之間的關係具有某種可辨別的原則或特徵。³¹Bull 進一步指出，人類在社會生活中所追求的秩序，並不是人類個體或團體間所存在的模式或律則性，而是一種能導出某種特殊結

²⁹ 在此要特別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搏和」一詞的概念，更能刻畫化國家中心論與社會中心論之間既存在對立態勢、卻又彼此滲透的互動關係。

³⁰ 舉例來說，Michael Leifer, *ASEAN's Search for Regional Order*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7). ; T. V. Paul & John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Joseph Liow Chinyong & Ralf Emmers, eds., *Order and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6). ; Amitav Acharya, "A More Ambitious ASEAN Faces Crucial Test," in Amitav Acharya ed., *Asia Rising: Who is Leading?*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8), pp. 135-139. ; Wang Gungwu & Zheng Yongnian, *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³¹ 換言之，這也間接意味著只要事物之間的關係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重新組合，據此所構成的模式或關聯型態將造就另一種不同的原則或特色，並且形塑出另一套秩序。

果的模式，這種模式將可促成某種價值或目標的特殊社會安排。他將類似的概念應用在國際關係領域中，主張社會秩序並不會自動造成，它需要參與其中的能動者創建與維持；當國家與政府則被視為是創建秩序、維持秩序的行爲者，國際秩序則是國家（或由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會）用來維繫基礎與主要目標的活動模式。

沿著 Bull 的思路，此種國際層級上的社會秩序之所以能持續存在，主要憑藉著秩序構成者本身對於共同利益、共同規則與共同制度的重視與維繫。首先，共同利益指的是國家間發展出一套適用於集體社會生活並且與各種生存目標、基本訴求相關的共享利害關係感。它可以來自於各國對暴力的恐懼、對於協定是否能生效的憂慮、或者是對於獨立狀態或主權安全的顧忌。第二種因素是共同規則，廣義來看，它包含了當代世界政治最基本的規範性原則、也涵蓋了國與國之間共同生存的規則、以及用來規範國家合作的各項規定。第三種因素則是共同制度，這裡所指的制度，並不一定是正式的國際組織或行政機制，而是一套被用來實現共同目標的習慣或實踐。在當代國際關係的經驗政治參照上，制度的類型包含了國際法、權力平衡、或者是強權間的管理體制等。³²

當我們將上述三種因素置於當前區域整合的經驗脈絡中，可以發現諸如歐洲統合運動所啓動的政治秩序、《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 NAFTA）所建立的自由貿易秩序、以及在拉丁美洲、南非、東南亞以及亞太等區域內由區域整合運動所生成、鞏固、維繫的新區域秩序，都是以國家政府爲主、以區域國際社會

³²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為活動場域，試圖發展共同利益、創設共同規則、並落實共同制度的跨國活動。³³這些地區在國家群與國際組織的推動下，幾乎都已經建立起共同的規則與制度，甚至有的區域開始進一步經營各種共同體的建構計劃，藉著區域化的合作計畫來打造各種具有區域特色、貼近在地政治的運作秩序。來自於各個區域整合進程的經驗，說明了以國家為中心的跨國主義運動不僅停留在理論層次的想像，更成為影響、維繫區域秩序的動力。更重要的是，這種區域秩序在持續運作之後，亦將會形構成特殊的跨境模態並且展現在區域層級的社會結構上，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規範或約束國家之間以及國家與其他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Bull 的主張到了後冷戰時期開始受到更廣泛的關注，原因在於冷戰的告終造成國際體系結構的鉅變，從而使得有越來越多的國際研究知識社群希望能藉著繼受 Bull 的核心理念，重新思索後冷戰國際秩序的本質與世界政治的未來新圖像。T. V. Paul 與 John A. Hall 所主編的《國際秩序與世界政治的未來》(*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該書除了探討秩序構成的背景、脈絡與機制之外，更將各種新興「跨國」現象與議題（如全球化、環境安全、大規模毀滅

³³ 針對當代區域主義經驗的個別探討與比較研究，可參考：Estrella D. Solidum, *Towards a Southeast Asian Community* (Quezon: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74). ; Estrella D. Solidum, *The Politics of ASEAN: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avid Wurfel & Cruce Burton,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Dynamic Region*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6). ; William D. Coleman & Geoffrey R. Underhill, *Regionalism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urope, Asia, and the Americas* (London: Routledge, 1998). ; Sajal Lahiri,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1). ; John Ravenhill,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tephanie Colob, "Beyond the Policy Frontier: Canada, Mexico,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FTA," *World Politics*, Vol. 55(2003), pp. 361-398. ; Finn Laursen ed.,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Hampshire: Ashgate, 2003). ; Gary P. Sampson & Stephen Woolcock, eds.,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Recent Experience* (Tokyo: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武器等) 視為影響國際秩序運作的潛在挑戰。³⁴這種將新興跨國議題融入國際秩序討論的嘗試，散見於後冷戰時期的國關理論文獻探討中，但諸如此類的專著並沒有直接討論或定位後冷戰時期國際秩序的本質與屬性，亦缺乏系統性地將跨國關係與跨國主義的理論意涵直接與國際秩序的形構進行聯結。一直要到 Muthiah Alagappa 所編著的《亞洲安全秩序：工具性與規範性特徵》(*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一書的出版，針對「秩序」本質進行重新詮釋並試圖類型化不同的秩序型態，國際研究的知識社群才得以從中尋得跨國主義與國際秩序的聯結，並且從中找到能滿足跨國主義區域化需求的理論與經驗依據。

Alagappa 將國際秩序區分成三種不同的類型，分別是：工具型秩序(*instrumental order*)、規範—契約秩序(*normative-contractual order*)、以及團結型秩序(*solidarist order*)等三種。這三種國際秩序代表著不同的研究傳統，並且分別深受現實主義、理性—自由主義(*rational-liberalism*)與共和自由主義(*republican liberalism*)等國際關係主要理論的導引，發展出各自的經驗對照。其中，工具型秩序主要由國家行為者所構成，具體展現在國家利益的各自實現上，國家會為了避免衝突並且促進共存來發展工具型秩序。就此，政治、軍事、安全議題成為展現工具型秩序的領域。相較之下，規範—契約型秩序主要依靠國家與制度來維繫，特別是國家行為者往往願意透過合作規則、或者是共享規範架構來實現個別利益或落實共同目的。也就是說，促進合作成為規範—契約型秩序的核心關懷，特別是在經貿議題方面最容易找到該秩序在經驗上的參照。最後，團結

³⁴ T. V. Paul & John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型秩序則是運作在以跨國行為者為主的信任建構、共同體義務設定、以及互動運作的法律規則基礎上。此種秩序的運作多半是希望能鞏固集體的社群利益，研究者多半可從跨國共同體、區域共同體的實踐或者是與人民福利相關的跨國活動與議題中找到參照。本文認為，以上三種類型的展現構成了世界政治運作的秩序光譜。光譜始端為象徵失序的殘酷戰爭，是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光譜彼端則是跨國共同體的願景，同時也是相對於戰爭與自然狀態的理想型願景。越接近戰爭狀態的秩序類型，越符合國家中心論的主張與特色；相較之下，越接近共同體狀態的秩序展現，則是更能彰顯出社會中心論的主張與特色（請參見圖 1）。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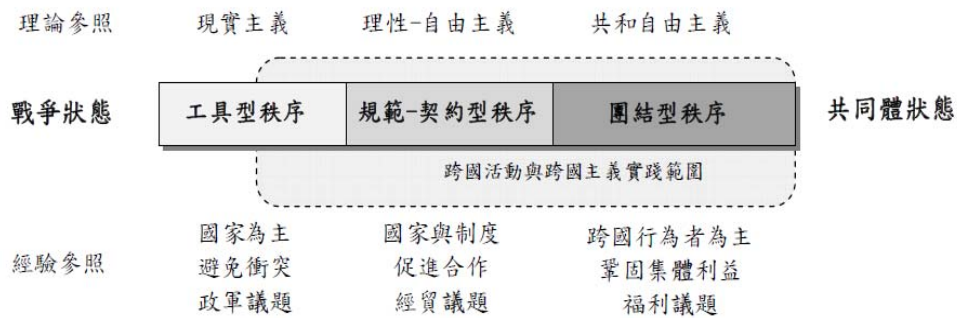


圖 1 國際秩序與跨國主義實踐光譜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參考自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1-52.

Alagappa 等學者之所以建立這套整合性的概念架構，除了希望呈現、彙整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對於國際秩序的不同詮釋之外，更重要的一項企圖，就是希望能藉此將國際秩序的概念放在最敏感的國際安全議題

³⁵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1-42.

中討論，並藉此找出亞洲秩序的本質。³⁶《亞洲安全秩序：工具性與規範性特徵》的分類其實也提供了極佳的參照，讓研究者可以清楚地探循那些鑲嵌在國際秩序中的跨國主義關注與變遷軌跡。相較於工具型秩序所立基的現實主義磐石，在規範—契約型秩序以及團結型秩序中，無論在議題上、或者是在行為者範疇上，都蘊含了更多的可能性。當國家不再是構成區域秩序的唯一行為者，制度、非政府組織甚至是個人等跨國行為者的參與，為規範—契約型與團結型秩序打造出新的關注焦點與議題領域，使它們超越個別國家利益與認同的考量，並且含納更多與基層「人民」福利相關或有助於發展跨國共同體的活動及集體利益。本文認為，由工具型秩序逐漸朝向團結型秩序轉換與變遷的方向性，展現出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與國家中心論跨國主義的對彰與搏和。從當前東南亞國家推動區域整合與共同體建構的經驗中，我們將更清楚地找到若合符節的變遷軌跡。

肆、共同體建構的延續與變遷：東南亞的經驗參照

在亞洲，自二十世紀中期以降的跨國合作與區域整合運動，結合了

³⁶ Muthiah Alagappa 在本書的第二個命題所言，亞洲安全秩序的本質被視為是工具型秩序的展現。在 2012 年 11 月 20 日，Alagappa 教授於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所舉辦的 *Constructing Security Order in Asia: Ideas, 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座談會中，他再度確認了當前亞洲安全秩序的工具型本質。儘管如此，作者認為當前亞洲安全的實際運作與維繫，隨著近年來亞洲區域化過程的發展，卻也帶著若干規範型-契約型秩序的色彩。

各種由國家啓動、目的在促成政府間進一步合作的發展計畫。這種以國家中心論跨國主義主張為基礎的合作趨勢，深受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知識社群與政策社群的重視，因而促成了具有工具型特色的亞洲區域秩序。然而，近年來，在亞洲區域內的興起的各種跨國活動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各種由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者所醞釀並推動的計畫，試圖重新書寫、影響新區域秩序的形構。由跨國行爲者所主導的改革訴求，不斷警告國家與政府切勿僅從國家利益或權力政治的考量來思考區域整合的方向，他們更積極提醒各國政府應當更重視人民的福利政治，期許能打造具有團結型秩序特色的新區域共同體。

上述現象尤其出現在東南亞區域整合過程中。過去四十五年來，由東協所推動的整合計畫正是國家中心論跨國主義的具體實踐，因為東協整合的邏輯長久以往便是以國家為主要行動者、以確保各國主權不容侵犯為原則、以降低國際衝突、促進共榮的國際合作為宗旨的大規模區域發展計畫，這也清楚地展現在各國面對合作關係時的種種現實主義策略考量。³⁷東協整合過程中所呈現出的跨國主義模式，鞏固了國家行爲者在主導東協跨國主義實際合作議程時的關鍵角色，同時也間接地形塑出以國家中心主義為軸心的區域秩序。此種區域秩序的運作，卻也框限了其他行爲者參與整合進程、甚至扮演主導者的可能性。

隨著東協整合程度的提增，區域內的政策社群在 1990 年代末期開

³⁷ 可參見：Michael Leifer, *ASEAN's Search for Regional Order*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7). ; Michael Antolik, *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0). ;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6). ; Donald E. Weatherbee, Ralf Emmers, Mari Pangestu, & Leonard C. Sebast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始醞釀各種建構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的行動計畫與戰略考量。三個共同體支柱—東協政治安全體(ASEAN Political Security Community, 簡稱 APSC)、東協經濟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簡稱 AEC)與東協社會文化體(ASEAN Social Cultural Community, 簡稱 ASCC)的設計,即是因應與時俱進的跨國挑戰與整合需求的戰略工具。正當東協國家在發展共同體過程中,不斷面臨來自於基層社會、與在地人民福利相關的改革訴求,這些由跨國倡議網絡、地方非政府組織、遊說團體甚至是個人所發動的批判聲浪,一再挑戰、衝擊東協國家的治理體制與東協國家群的既有合作模式。³⁸當這些以福利政治為訴求的民間需求擴大醞釀成具體的政治改革意見,並且逐漸轉換成龐大的跨國改革聲浪時,東協成員國必須得在既有的整合議程中開放更多政策論述空間,一方面納入公民社會的意見,另一方面開始審慎研擬各種回應措施以回應在地人民的需求與福利。在近期的共同體建構議程中,「以人民為中心」的東協(people-centered ASEAN)開始成為打造新東協的亮麗口號,並且在體制內的《東協憲章》制訂過程中一度影響共同體建構的未來路徑。³⁹相關改革呼籲也藉著東南亞跨國公民社會平台如「東協人民大會」(ASEAN People's Assembly, 簡稱 APA)、「東協人民論壇」(ASEAN People's Forum, 簡稱 APF)、「東協公民組織會議」(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 簡稱 ACSC)等機制,提出「人民聲明」(People's Statement)來對照東協系列會議的菁英宣言,並藉此試圖影響東協共同體的議程設定。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多年的努力,在 2009 年舉辦的第十四屆東協高

³⁸ Donald K. Emmerson, *Hard Choice: Security, Democracy, and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³⁹ 譬如,「東協名人小組的憲章報告書」(EPG Report of ASEAN Charter)所揭示的若干創新原則,亦參見: Alexander C. Chandra, "Civil Society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Regionalism in ASEAN," *Hosei Kenkyu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s*, Vol. 75, No. 4(2009), pp. 47-69.

峰會中，輪值主席泰國首度開放公民社會團體參加相關會議。儘管與會的跨國行為者所能倡議與討論的範疇被侷限在第三支柱（東協社會文化體）上，但這已經是東協自創設以來第一次在重要的領袖高峰會中納入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對話。⁴⁰

這些新的跨國主義訴求構成了新的區域關懷，同時也為區域秩序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當東協共同體開始吸納更多來自於基層社會的改革與規範性訴求時，東協的發展與區域合作的路徑開始有了調整與轉換的跡象。據此，來自於公民社會的跨國需求與跨國主義實踐成為驅動東協共同體從狹隘的工具型秩序朝規範型—契約型秩序、甚至是理想的團結型秩序前進的動力。⁴¹究其運作軌跡，可以發現這股力量伴隨著非國家行為者的積極倡議，或者透過多元跨國行為者的穿國網絡，逐漸滲入以國家政府為主要行為者的區域合作議程中，形成各種以基層公民社會改革為訴求的改革倡議。此一改革訴求為了要限制國家中心論跨國主義的治理實踐，從而積極宣揚社會中心論的跨國主義模態。在此要特別討論的是，這種型態的跨國主義改革聲浪，基本上是將關注焦點由鉅觀的國際或區域動態、中觀的國家利益或制度架構轉移到微觀的人民福利權利上的政治活動。在概念上，它的核心理念其實與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或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的關注要件相似，都是試圖要解構當代以國家為中心的各種「傳統安全與政治關注」，並進而重新建構一套「以人為本的新福利政治議程」。

⁴⁰ “The Historic 14th ASEAN Summit for Thailand and a New Chapter for ASEAN Members,” *The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http://thailand.prd.go.th/ew_news.php?id=4105&a=3> (February 26, 2009).

⁴¹ ASEAN-ISIS & ISDS, eds., *The Role of the People in Building an ASEAN Community of Caring and Sharing Societies* (Manila: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7).

本文認為，這種新福利政治議程鑲嵌在東協共同體的建構過程中將呈現出以下四種特色。首先，共同體實踐的議題領域將更重視基層民眾的生存權益與福利。從安全指涉對象的角度來看，新福利政治議程所關注的對象與議題與人類安全一致，⁴²舉凡牽涉到人類基本權利的議題範疇，以及有可能威脅到人類生存的各種挑戰，如人權、飢餓、貧窮、工作權等議題都包含在此種以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為核心的新整合議程中。⁴³不過，縱使相關議題都具備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關注，但不同國家受到國家利益與戰略考量的牽制，其所重視的共同體建構要件、內涵與方法仍有所不同。⁴⁴

其次，共同體實踐的規範價值將更強調人民權益的優先性。政府或國家之所以要推動各項政策或發展任何對外行為，目的在於保護人民與保障人民的基本權益。這種常見於聯合國宣言的「以人為本」主張，開始更直接地為區域組織或共同體成員所運用，成為推動集體行動與區域合作的規範價值。⁴⁵

再者，共同體實踐的治理過程必須要落實人民的直接參與。儘管人民的權益係由政府所保障，但是人民應該具有更充分的發聲管道，並且

⁴² Dewi Fotuna Anwar, "Human Security: An Intractable Problem in Asia,"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36-567.

⁴³ B. G. Ramcharan, *Human Rights and Human Security* (New York: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2).

⁴⁴ Yukiko Nishikawa, *Human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37-53.

⁴⁵ Rob McRae & Don Hubert, eds., *Human Security and the New Diplomacy: Protecting People, Promoting Peac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Neil MacFarlane &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A Critical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具有更多元的直接參與治理過程的途徑及機會。⁴⁶藉著人民的直接參與，區域共同體的建構不再被視為是菁英政治的閉門產物，人民的壓力與改革呼聲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的決策。就此得以確保新福利政治議程不會在區域合作過程中被冠上國家利益的菁英考量所忽略或犧牲。⁴⁷

最後，同體實踐的治理工具將更加多元。在具有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特色的共同體建構計畫中，人民除了可以直接參與，更可透過公民社會團體、跨國行為者、甚至亦可藉由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組織體制內的平台來影響治理過程。相關跨國行為者的存在，確實可以提供更豐富的治理倡議或政策工具，藉以保障基層人民的權益。

新福利政治議程以保障基層人民與發展利益為改革旨趣，由非政府組織或跨國行為者所倡議，透過跨國主義的實踐在區域合作運動過程中醞釀、發酵，試圖建立起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模態。甚至亦有若干激進團體希望能藉著跨國化的倡議來重新打造一套「去國家中心化」的區域秩序。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改革理想都能引導東協共同體的實踐方向，在近年來的發展過程中，國家中心論者在捍衛制度與議程上的種種逆襲，清楚可見。首先，就制度設計來說，來自於基層社會的倡議或新的理念多半只能進入(或在概念上融入)既有議程，成為規範性宣示的一部份，真正能有效落實理念並將其轉換成實際治理政策者僅佔少數。⁴⁸箇中原

⁴⁶ Nafsiah Mboi, "Closing Address," in ASEAN-ISIS & ISDS, eds., *The Role of the People in Building an ASEAN Community of Caring and Sharing Societies* (Manila: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7), p. 23.

⁴⁷ Andrew McGregor, *Sou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217.

⁴⁸ 譬如，目前已經不再運作的東協人民大會，過去所提供的政策建議含納相當豐富的新福利政治議程，但其中絕大多數的倡議並沒有被東協領導人所接受，相關報告書可參見：ASEAN-ISIS & ISDS, eds., *The Role of the People in Building an ASEAN Community of Caring and Sharing Societies*, *op. cit.*

因在於相關改革理念儘管立意良好，但在實踐上與執行上卻與東南亞國家的國家利益與核心安全觀多有衝突，從而難以撼動、更難取代國家在區域秩序經營過程中的核心角色。⁴⁹

國家中心主義者的逆襲，展現在安全觀的重新打造與其對制度設計的全盤掌控上。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東南亞國家在建構東協共同體議程上所納入的「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理念與實踐。由於非傳統安全在概念上並不一定與國家主權或國家安全對立，同時亦較人類安全強調國家所扮演的安全提供者角色，這也使得結合了「非傳統安全」的跨國主義實踐更能維繫、鞏固以國家為中心的區域秩序運作迴路。另外，在制度設計上，儘管東協自 2009 年開始已經在高峰會體制內納入公民社會團體的對話空間，但國家的堅持亦展現在對體制的設計與干預上。這些來自於公民社會的跨國行為者代表，往往是由國家政府所推薦，在為人民喉舌的代表性方面備受外界質疑。⁵⁰舉例來說，甫舉行的「東協公民社會會議」(ACSC/APF 2012)看似和諧地強調「將東協轉型成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體」(Transforming ASEAN into a People Centered Community)理念，並且以「東協人民攜手打造東協共同體」(We, the People of ASEAN Joining Hands Together an ASEAN Community)為題，匯聚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代表等跨國意見領袖的共識。但此種看似擁抱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主張的共同體建構邏輯背後其實受制於柬埔寨輪值主席國的政治干預。今年的會議被視為是「純非政府組織」與「偽非政府組織」的對抗，也就是「亞洲人民倡議團結網絡」(the Solidarity for Asian People's

⁴⁹ DewiFotuna Anwar, "Human Security: An Intractable Problem in Asia,"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36.

⁵⁰ "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 2012," *LGBTsupports*, <<http://www.lgbtsupports.org/asean-civil-society-conference-2012/>> (July 31, 2012).

Advocacy, 簡稱 SAPA) 與柬埔寨官方支持的「柬埔寨正面改革組織」(Positive Change in Cambodia)之間的競爭。柬國政府在今年突然以不成文規則，告知各東協成員可以自行推薦並選送各國的公民社會代表參與東協高峰會中的介面對話(interface meeting)；此舉刻意繞過了東協公民社會會議選取與會代表的機制與規範，同時也引起各界的激烈批判。更令人錯愕的是，在「幸運星旅館」(Luck Star Hotel)召開的公民會議系列，有若干場次被管理人員刻意杯葛並要求立即停止（如討論緬甸擔任 2014 年輪值主席議程），並威脅將以斷電方式終止會議。⁵¹上述由國家機器刻意操弄的干擾作為被視為是國家中心論實踐逆襲的最佳例證，它不僅將人民的聲音與意見樣版化，更嚴重地鬆動、瓦解共同體的公民社會基礎。

當東南亞國家積極地推動共同體建構議程的同時，我們看到了國家政府釋出更多的政策論述空間並且希望納入公民社會意見的各種安排，但我們同時也見證了若干堅守國家中心立場的政治菁英，用看似開明、自由的表象框限來自基層的新福利政治需求與改革聲音。從共同體所欲彰顯的秩序與跨國主義邏輯來看，由東協政治安全體的建構所呈現的工具型區域秩序，仍舊是東協成員在實現國家利益、避免衝突、促進共存時的首要考量，同時也是「延續」東協合作的重要基礎。隨著整合進程的加快，源自於內部的發展需求與外部壓力迫使東協必須思索轉型之途，這也驅動東協加速發展各項回應方案。藉著落實東協經濟體藍圖，共同體變遷的軌跡得以展延到規範-契約型區域秩序中。相較之下，當東協系列會議所示出的各種政治宣示與聲明高聲宣揚共同體成員間的信任、區域意識、認同與規範之際，各種由國家與政府為了捍衛主權利益所設計

⁵¹ “The 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 a ‘people-oriented’ ASEAN?” *EASTASIAFORUM*,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4/20/the-asean-civil-society-conference-a-people-oriented-asean/>> (April 20, 2012).

出的開明宰制舉措，弱化了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者對於團結型區域秩序的期待。如果團結型區域秩序僅能在東協社會文化體中實現，這將無異於宣布東協共同體很有可能將不再有個階段的質變，當然，這同時也意味著國家中心論跨國主義者的勝利（參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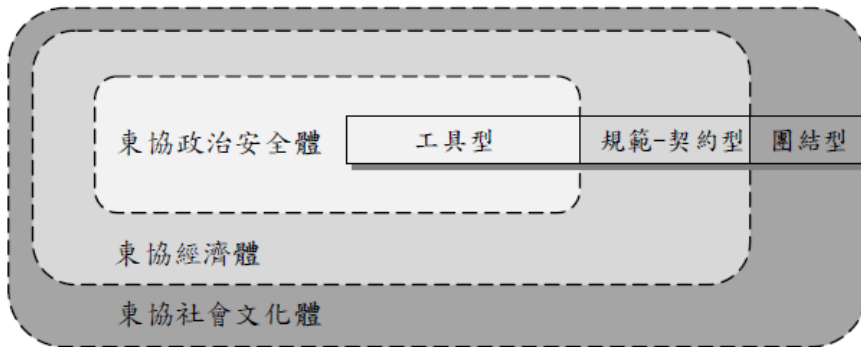


圖 2 鑲嵌在區域秩序中的東協共同體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

伍、結語

當前知識社群對於跨國主義的討論，往往側重於跨國行為者或非國家政府的角色，有時甚至簡化了國家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透過前文所探索的理論內部迴路與區域經驗的參照，本文認為國際關係的知識社群有必要更審慎檢視跨國主義的研究議程，同時妥善看待國家的定位與角色。跨國主義的論證並無法排除國家行為者作為關鍵變數的可能性，更不能

刻意輕忽國家行為者經營跨國關係、投入跨國議題或者影響跨國行為者的能力。研究者應該重新看待轉變中的國家能力，並從跨國網絡的形構過程中抽絲剝繭，釐清國家行為者的特定意圖與作為，才能呈現鑲嵌在跨國主義議程中的國家中心論與社會中心論的對彰與搏和。

就此，新型態的國際關係跨國主義研究除了要凸顯不同區域內的跨境模態所具有的特殊內涵，應當細緻地探索並指認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在跨國主義理論與實踐中的互動、互助或緊張關係。在區域層級上，新興跨國活動與現象的蓬勃發展，將透過各種跨國行為者的訴求與跨國活動網絡，滲入以國家為主導者的區域合作架構中，進而對區域秩序的形構造成影響。當然，對於國家行為者來說，國家政府爲了要回應類似的新福利政治議程與改革訴求，很有可能將攸關人民福利的關懷納入區域合作與共同體建構的議程中。換言之，一旦社會中心論跨國主義的影響開始滲透進入實際的區域合作過程時，作爲合作執行者的國家將可能會面臨合作路徑轉換的問題。當然，這種合作路徑的轉換受到國家中心論與跨國中心論彼此互動、互助或搏和所影響，儘管轉換的目的是希望能建構出更能符合國家或人民需求的區域秩序，但此一區域秩序仍將會是國家群集體行動所導出的政策選項與政治結果。

誠如 Nye 與 Keohane 所言，世界政治隨時都在改變，對於以理解、詮釋、甚至預測當代國際關係發展爲職志的研究者而言，我們的理論、概念、所使用的典範、甚至是各種分析工具始終跟不上時局的變革。⁵²這並不代表各種理論性反省與理論化的工作將不再具有意義，反之，唯有

⁵² Joseph S. Nye Jr. & Robert O. 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 Conclusion," *op. cit.*, p. 371.

透過理論概念與構成迴路的重新檢視、檢討與修訂，並藉著揭示、再現隱含在理論體系內的衝突與對立關係，才能有助於研究者提出更具時代意義的洞見與命題，進而對特殊個案提出更細緻、更動態的解釋。本文希望能拋磚引玉，藉由重回跨國主義的理論化探討，尋找區域化參照的適當解釋，以利國際研究的知識社群重新斟酌跨國主義研究議程的新趨勢。

(收稿：101年04月16日，修正：101年06月28日，接受：101年08月03日)

參考文獻

英文部份

- Alagappa, Muthiah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Antolik, Michael, *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0).
- Aron, Raymond,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 Annette Baker Fox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1966).
- ASEAN-ISIS & ISDS, eds., *The Role of the People in Building an ASEAN Community of Caring and Sharing Societies* (Manila: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7).
- Bob, Clifford, *The Marketing of Rebellion: Insurgents,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Burton, John W., *Systems, States, Diplomacy and Ru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Buzan, Barry,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ghton: Wheatsheaf, 1983).
- Coleman, William D. & Geoffrey R. Underhill, *Regionalism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urope, Asia, and the Americas* (London: Routledge, 1998).
- CSCAP,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 Study Group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toP) Final Report*

- (Phnom Penh: CSCAP, 2011).
- CSCAP, *CSCAP Study Group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toP): First Meeting Final Report* (Jakarta: CSCAP, 2010).
- Donnelly, Jack,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Emmerson, Donald K., *Hard Choice: Security, Democracy, and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 Evangelista, Matthew, *Unarmed Forces.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o End the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laser, Charles L.,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Hertel, Shareen, *Unexpected Power: Conflict and Change among Transnational Activis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obson, John M.,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Keohane, Robert O. &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Lahiri, Sajal,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1).
- Laursen, Finn ed.,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Hampshire: Ashgate, 2003).
- Leifer, Michael, *ASEAN's Search for Regional Order*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7).
- Leifer, Michael,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6).

- Liow, Joseph Chinyong & Ralf Emmers, eds., *Order and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6).
- MacFarlane, S. Neil &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A Critical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cGregor, Andrew, *Sou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8).
- McRae, Rob & Don Hubert, eds., *Human Security and the New Diplomacy: Protecting People, Promoting Peac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Nishikawa, Yukiko, *Human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0).
- Orenstein, Mitchell A., Stephen Bloom, & Nicole Lindstrom, eds., *Transnational Actors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Transitions* (Pittsburgh: University Pittsburgh Press, 2008).
- Paul, T. V. & John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ries, Ludger ed., *Rethinking Transnationalism: the Meso-link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Ramcharan, B. G., *Human Rights and Human Security* (New York: 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 2002).
- Ravenhill, John,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isse-Kappen, Thomas ed., *Br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ampson, Gary P. & Stephen Woolcock, eds.,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Recent Experience* (Tokyo: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mith, Jackie, et al.,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olidum, Estrella D., *The Politics of ASEAN: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olidum, Estrella D., *Towards a Southeast Asian Community* (Quezon: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74).
- Tarrow, Sidney,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Thachuk, Kimberley L. ed., *Transnational Threats: Smuggling and trafficking in Arms, Drugs, and Human Life* (West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 Tsagourias, Nicholas,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 Wang, Gungwu & Yongnian Zheng, *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Wapner, P.,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World Civic Poli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 Weatherbee, Donald E., Ralf Emmers, Mari Pangestu, & Leonard C. Sebast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 Wurfel, David & Cruce Burton,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Dynamic Region*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6).

Acharya, Amitav, "A More Ambitious ASEAN Faces Crucial Test," in Amitav Acharya, *Asia Rising: Who is Leading*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8), pp. 135-139.

Anderson, James, "Questions of Democracy, Territoriality and Globalization," in James Anderson ed., *Transnational Democracy: Political Spaces and Border Crossing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6-39.

Anwar, Dewi Fotuna, "Human Security: An Intractable Problem in Asia,"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36-567.

Mboi, Nafsiah, "Closing Address," in ASEAN-ISIS & ISDS, eds., *The Role of the People in Building an ASEAN Community of Caring and Sharing Societies* (Manila: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7), pp. 20-24.

Nye, Joseph S., Jr. & Robert O. 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 Conclusion," in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71-398.

Pempel, T. J., "Introduction: Emerging Webs of Regional Connectedness," in T. J. Pempel ed.,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0.

期刊論文

Abdullah, Rashidah, "NGO Advocacy on Women's Health and Rights in

- Southeast Asia,” *Development*, Vol. 46, No. 2(2003), pp. 33-37.
- Ballemy, Alex J. & Sara E. Davie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40, No. 6(2009), pp. 547-574.
- Bryant, Raymond 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ality: ‘Consuming’ Biodivers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Philippines,” *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No. 2(2002), pp. 268-292.
- Buzan, Barry, “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 Decentred Glob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 1(2011), pp. 3-25.
- Chandra, Alexander C., “Civil Society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Regionalism in ASEAN,” *HoseiKenkyu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s*, Vol. 75, No. 4(2009), pp. 47-69.
- Chavez, Jenina Joy, “Social Policy in ASEAN: The Politics of Integrating Migrant Labour Rights and Protection,”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 7, No. 3(2007), pp. 358-378.
- Cheong, So-Min, “Controlling the Coast,”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Vol. 51(2008), pp. 391-396.
- Colob, Stephanie, “Beyond the Policy Frontier: Canada, Mexico,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FTA,” *World Politics*, Vol. 55(2003), pp. 361-398.
- Cooley, Alexander & James Ron, “The NGO Scramble: Organizational Insecurit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national A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2002), pp. 5-39.
- Gulbrandsen, Lars H. & Steinar Andresen, “NGO Influe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yoto Protocol: Compliance, Flexibility Mechanisms and Sink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4, No. 4(2004), pp. 54-75.

Keohane, Robert O. & Joseph S. Nye Jr.,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1(1974), pp. 39-62.

Klinke, Andreas, “Deliberative Democratization across Borders: Participation and Deliberation i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4(2011), pp. 57-60.

Monten, Jonathan, “Thucydides and Modern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2006), pp. 3-25.

Okereke, Chukwumerije, Harriet Bulkeley, & Heike Schroeder, “Conceptualizing Climate Governance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9, No. 1(2009), pp. 58-78.

Paasi, Anssi, “The Resurgence of the ‘Region’ and ‘Regional Ident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Observations on Regional Dynamics in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2009), pp. 121-146.

Peterson, M. J., “Transnational Activity,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World Politics,” *Millennium*, Vol. 21, No. 3(1992), pp. 371-388.

Phan, Hao-Puy, “Institu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Southeast Asia: A Survey Repor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1, No. 3(2009), pp. 468-501.

Price, Richard, "Reversing the Gun Sights: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argets Land Min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3(1998), pp. 613-625.

Sikkink, Kathry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Human Right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1, No. 3(1998), pp. 516-523.

Tarrow, Sidney, "Transnational Politics: Conten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001), pp. 1-20.

Van Apeldoorn, Bastiaan, "Theorizing the Transnational: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No. 2(2004), pp. 142-176.

Vertovec, Steven,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 No. 2(1999), pp. 447-462.

Transnationalism Revisited: A Theorizing and Regionalizing Scrutiny

Yang, Alan Hao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cademic inquiry of transnationalism has been highly emphasized since the 1970s. Transnationalist research agenda, nonetheless,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the proclamations of state-centrism with specific focus on the extension of power politics dominated by states or governments. In order to unfold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transnational modality” which is moving beyond the state-centric limitations, this paper will scrutinize the concept of transnationalism by analyzing its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contending its relation with state-centrism based upon a middle rang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t contends that given modality of transnationalism may challenge realist paradigm of regional order by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micro politics at regional and individual level. This paper further theorizes the discussion of transnationalist modality and regionalizes its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Southeast Asia. Finally, it evaluates the corresponding implications to current path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ferred.

Keywords: transnationalism, theorization, reg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ransnational modality